

独家报道

济宁“婆婆车”：难以忘怀的慈爱

图文 梁方苏



现在说济宁的“婆婆车”，年轻人可能一脸茫然，完全不知道为何物。就是上了年纪的人，恐怕也早已淡忘。算起来，这种家用的婴幼儿小推车，有四十多年没在视野中出现了，“婆婆车”这颇具特色的车名消失得更早。

今年初秋的一天，邻居搬家，在院子里和一位收废品的商谈旧物的处理。我下楼时一眼瞥见了其中一架婆婆车，不由地一阵心动，赶紧上前去看。可不嘛，这架木头打制的车子，虽然油漆斑驳，但结构依然完好，老模老样地混在一堆杂物之中，还真是有点稀罕。

久违的亲切悄然而生，我抓住车把推了推，车轮已不太灵活了，当然有年头没上路了。收废品的为了压低价格，极力贬低，说现在早没人再用这种既土气又笨重的老物件了，放在家里占地地方。

邻居和我听了这话，都不由心生不快，马上列举当年婆婆车帮人们担负的家国重任和他争辩。这位中年的收废品的人，一脸的以为为然，接话说道：“说得再好，也是过时了的东西，不值钱。既然恁看着好就继续留着，卖不卖也随恁。”一句话噎得我们老哥俩够呛。

乔迁新居，孩子们不同意把旧家具搬进了丁档次的新楼房，看来这架婆婆车，难免被当作废物处理了。

事过之后，怅然之情久久不能散去，心头升起许多感慨。难道这又是所谓代沟产生的问题？年轻人总觉得老人对旧物过分留恋，这也舍不得丢，那也舍不得拽，已经不值什么钱却仍当成宝贝。他们哪里知道，老人们对某个物件的那份感情，特别是那些共同经历艰苦岁

月，帮我们做过无数事务，纠缠着揪心故事的老物件。它们曾是无声的伙伴，岁月曾赋予了生命和情感，人对它好，它对人好，忠实地与我们鞍马相随，苦乐相伴。

婆婆车就是岁月里创业、守业、奋斗与谋生的老物件之一。四十多年前，济宁市区的大街小巷和居民院落，还常看到婆婆车的来来往往、进进出出。车里的乘员，就是各家的宝贝娃娃。

那时车的名字已更新了，有人叫它娃娃车，有人叫它婴儿车，还可能有人叫它元宝车或小推车，年迈之人依旧叫它婆婆车，那才是老济宁传统的称呼。这个叫法似乎更有故事性，婆婆车当然和婆婆有关系，不然怎么会起了这个名。

婆婆这个专属的身份，是相对媳妇而言，指的是公公的老伴，丈夫的母亲，孙子的奶奶；日常婆、媳相见，还真没有直接喊“婆婆”的。婆婆往往是家庭主妇，在众多的家庭事务中，帮助儿媳照看孙子那是必须的。

照看孩子这个活倒不用很大力气，但需要精細入微，特别费心缠手。若全被孩子的吃喝拉撒、怀抱哄睡缠住身，家中还有那么多事务怎么办？勤劳的人们总会想出办法，这当儿，聪明人便发明出了专门护理婴儿的车子。

这个发明者可能就是婆婆，要不怎么会以“婆婆”命名呢？至于是哪个朝代，哪个具体的婆婆就说不清了。发明者也可能是生了孩子的儿媳，她看婆婆辛苦，自己也有繁忙事务缠身，于是想出做一个车子能像婆婆一样照顾孩子，减轻大人负担，因此把这辆车叫作婆婆车

也合情合理。最初动议的不管是谁，一定是富有爱心和智慧的母亲，如果没有亲身照看婴幼儿的体会，怎么会把婆婆车设计得有那么多体贴周到的功能呢。

婆婆车大多为木质结构，四边花棱结构的框架，围成了长约三尺、宽约两尺、高约两尺半的车身，整体又可分成上、中、下三层。下层中部是脚踏板，前后两端是两个矮矮的储物箱。箱子的顶板即是小车的中层，与车子前、后框架组成了两个相对的座椅。两椅中间，用一块活动木板搭通，便组合成一个小床。活动木板取出，放进车子上层的卡槽里，又成了两张椅子间一方小小的饭桌，正适合幼儿坐着吃饭。车子底部装有四只车轮，后部装有加高的车把，方便大人推拉。

就这样一架简单的小车，可以承担起婴幼儿到幼儿期的许多护理事务。做摇篮，做小床，当座椅，当饭桌、学步车等等。小孩成长过程中学爬、学坐、学站、学吃饭、学走路，在车子的护卫帮助下，都变得舒适、安全；大人们也分外省心、省力、省事，不仅可以放心做其他家务，还可以推起孩子到外边遛弯、串门、买菜、购物，方便极了。

老济宁竹器业发达，竹竿巷竹器店也有用竹子做的婆婆车，也有南方运来的藤条编制的婆婆车，功能和木制婆婆车相似，结构轻巧，从两侧看车子上宽下窄，呈元宝形，因此被叫做“元宝车”，表达了人们对下一代富贵吉祥的祈愿。在济宁使用这种车子的，多是教师、医生、机关干部等家庭。市民家庭还是最喜欢木制的婆婆车，应为它宽大、结实、方便、耐用，除照管小孩外还可干更多的家务。

使用过程中，人们还对婆婆车不断改进，从最初的类似摇篮原地不动，到装上轮子变成车子。后来车轮又不断进步，早先转起来吱吱作响的木轮，变成了咕噜噜转的铁轮，后来又从铁轮发展到车圈辐条结构的橡胶轮，直径的加大和新材料的应用，使车子推起来更为轻便，有的还在车子底盘和轮轴之间增加了减震弹簧。这时人们开始逐渐放弃婆婆车的原名，改叫为小推车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小推车几乎是每个家庭的必需品，不仅用来照看孩子，还用来买菜、买粮、买煤。有的家庭甚至推起小车装上货物沿街叫卖，做点小生意维持生计。夏卖冰糕，秋卖水果，冬卖烤芋头，春卖蜗牛牛，成为老济宁街头的一景。改革开放后，小推车装了更多的物品出现在市场上，闲置不用的婆婆车，一时又派上了大用场，成为人们就业、创业的原始工具。

如果说起婆婆车最深的记忆，还是当年老市区的街道上。每天一早一晚的上下班时刻，女职工们推着婆婆车，载着孩子，带着吃喝，匆匆赶路的场面，那是小城的一道风景线。可以说，不断改进的婆婆车，不仅减轻了人们照看孩子的劳累，还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解放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提倡妇女走出家庭，许多

年轻女性纷纷就业，走向工作岗位。家中幼小的孩子怎么办？家中有人照看还好，无人照看怎么办？现在没孩子，将来结婚生子后怎么办？解决这些问题，婆婆车还真发挥了巨大作用。

国家为了照顾女职工，在工厂企业普遍建立了托儿所、娃娃室，女职工把孩子带到单位，交给托儿所后，就可以回到工作岗位，中间还有规定时间去给孩子喂奶。那时人们生活条件普遍低下，但就这一点来说，是够好的了。这时婆婆车可真起到了“婆婆”的作用。

带着小孩的职业妇女够辛苦的，有的工厂离家十多里，当妈的需要起个大早，用车装上孩子，一步步推着去上班。有的工作需要上夜班，大夜里还要推着小车上下班。当丈夫的心中不过意，想尽千方百计抽出时间去接送妻儿，于是街道上出现了丈夫骑自行车带着妻子，妻子牵着婆婆车载着孩子，一家三口组成了颇具时代特色的车队。若没有婆婆车帮助，生活岂不更麻烦。

我结婚后妻子怀了孕，深知此事重大，便自力更生动手打了一架婆婆车，那时应该叫小推车了。那副车轮，还是托人从上海买来的。后来，夫妻二人用这架小推车，推着儿子早早晚晚、风风雨雨、往往复复、上班下班，把孩子一天天抚育长大。你说能对这车子不亲切吗？当时哪家的婆婆车好用、好使、好看，也挺引人注目，亲戚、朋友、邻居常会借用。我做的车子后来送给了亲戚，亲戚用后又转送给了他人。听说自己亲手做的东西一直被用着，心里挺高兴的，人尽其力，物尽其用是多好的事啊。

婆婆车的故事里蕴含着深切的母爱，小小的婆婆车，寄托着我们那辈人的感情。时代发展的过程中，车子无疑是进步最快的。不需往远处说，就是我们济宁如今的大街小巷，奔跑着的现代化车子，无论是数量，还是品种，都多得难以数清。各种新功能、新结构、新型式

的车子，还再层出不穷，不断上市。老式车子的淘汰是必然的，但对有些具有时代特点和铭心故事的老物件，我们不能忘得无影无踪。真希望在广袤、漫长的历史画卷的某处，能有婆婆车小小的身影，打这以后，还有人能说起婆婆车的故事。



想，我们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，它有巨大的合理性和生命力。

在这些思考的过程中，我就感受到，儒家文化的合理因素。所以我就在这个过程中，写了一些诗作。《我在孔子故里歌唱》这一次是再版，增加了一些作品，其中一个版块就是以我个人的认识，看待阐释儒家学说，在感性层面做的初步的阐释。第二个是对曲阜的人文古迹、经典等做的描绘。第三个就是我个人的一些情感，包括我的思想转折和目前对孔孟思想的领悟。

因为在曲阜，写现代诗的人实在不多。但是曲阜有大量的历史诗，所有的文人墨客政客，跑到曲阜以后，写了大量的格律诗词。现代的专家学者，也写了一些格律诗。但是现代诗，以当前代人自由思想的状态，来描绘曲阜，还没有这样的诗集，所以我就写了这一部诗集。在当年的世界孔子大会上，这本诗集是发给每一位代表的三本书之一。我想从这个角度讲，我也是为了济宁和曲阜，做了一些文化方面有意义的事情。

黄亚洲还谈到《开天辟地》等红色文化题材作品中，涉及孔子和儒家文化在剧情中的体现。他说，“这也是我多次到济宁，来到曲阜后的一些感受。”



间，有着怎么样的联系呢？黄亚洲表示，向后看，就是为了向前看。向后看，是整理经验教训，汲取优质内容，获得向前看的力量。

《我在孔子故里歌唱》创作中，如何处理诗学、美学和孔孟文化之间的关系，如何进行调学？黄亚洲说，诗人要用多种艺术手段和写作方式进行写作。站在诗人的层面，不能照搬，照搬就变成了解说词，要有调动人们情感的能力。艺术实际上是一种摸索，通过积累，形成一定具有规律性的内容，从中来处理描绘的文本。

在济宁期间，黄亚洲参观了乔羽纪念馆和郑均纪念馆。

《卡特教练》是著名导演托马斯·卡特的作品，影片根据真实故事改编，讲述了一位高中篮球教练，带领自己校队拼搏的故事。那就不得不说说肯·卡特教练的事。

肯·卡特，由加州一高中篮球队教练，成为盐湖城冬奥会美国队教练，国家队里不少成员，就出自影片中的里奇蒙德高中篮球队，他的儿子德米恩，更因此获得了西点军校的全额奖学金。而他的最惊人之举，就是1999年那次禁止他所率领的常胜队出战联赛，只为了他们考试不及格这个很简单的理由。

这是一位教练，通过篮球让队员的人生轨迹发生改变。篮球，已经是那些队员生命一部分。卡特教练，不止想让球队赢球，让队员像赢家一样打球，更希望他们去赢得生活，有美好的未来。但是，这并不是简单的事情，阻碍重重。然而，卡特教练坚持了，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，得到了队员的理解，队员获得了光明的生活。

说起运动，说到黑人运动员，首先想到的除了百米跑道上的矫健身影，就必然是篮球。有人说，体育电影中最吸引人的种类，便是篮球电影，它快节奏的动作，几乎全场的高潮，不会给你的心脏以喘息的机会。至于一部关于黑人篮球的电影，尤其是关于一个名教练率领的名队，精彩就更不用提了。

或许，生活中有太多不由我们去决定。事实是，这就是我们的生活。迷路，也许可以说是小事。可怕的是我们甚至都不想去想着要找那路，而放弃了。

“你心中最怕的是什么？”生活，总会问我们如此这般问题，让我们不得不去寻找答案。生活的表象也总会糊弄我们，让我们以为“好像一切都会没问题，一切都会美好”。

还好，就像太阳每一天都会从东方升起，阳光撒遍大地。生活中，总会有一个东西，一件事，一个人，来提醒我们。在一个全黑的房间里，只要点燃一根蜡烛，它的光芒就会遍洒各个角落。一个人的言行可以感染一队人。

于是，我们需要明白了，什么样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。而且，找到灿烂生活的道路并不是那么难。最怕，我们惧怕“光明”——可以让我们拥有的美妙人生。

“顿悟”之后，昂首迈步，要行动。打好篮球，重要的是要去练，不懈努力。想要那美妙人生，就必须要去追寻，坚定信念。

曾执导过2001年大热影片《留住最后一只舞》的托马斯·卡特，这次总算有机会把他处理“动作场面”的技术发挥得淋漓尽致——几乎所有涉及到篮球比赛的场面，都让人心跳加速。影片另一个亮点则是歌手亚香缇的参演，这位近年美国数一数二的R&B女歌手的首次上镜，也一反常态地备受好评，看来只要有合适的角色，她的事业必定风生水起。

在影片中，首先值得庆幸的是，最后卡特的球队输了，也许这是对于电影最完美的结局，我一直觉得类似于这样竞技的电影，很难突破一个藩篱，落后，逆转，压哨，庆祝，故作的高潮，也就像小泽的呻吟，听着别扭。看到一半的时候，我总是对卡特接收球队后不断的连胜疲劳，也许这是体现能力不可或缺的，但我更希望看到的是失败后，他的控制能力，然而导演为他制造的困难远比现实小得多，但电影毕竟是电影，所有的失败都浓缩在了最后的一场州淘汰赛。这种起伏，就像调味的鸡精，半勺就够了。

不错的励志电影，也有很多值得回味的台词，卡特在这里，更像是一个教父，关于成长，关于奋斗，关于挫折，关于选择……

也许我们应该记住电影里很经典的一句话：有些东西虽然你值得拥有，但并不代表别人会送到你手上，最重要的还得自己努力地拼抢！

看懂家乡了吗

王智

带娃看了电影《我和我的家乡》，琢磨着他应该不容易看懂，可反过来一想，我自己又看懂了什么？

家乡是童年的属地，或从小长大的地方吧。家乡是童年的载体，是人生最初而嵌入最深的一方水土，是童年时认为整个世界的地方，从这种意义上说，家乡约等于童年。

家乡是我们长大之后，力量与幸福的源泉。童年将我们的未来悄然定下了基调，我们就是在用家乡童年的一切在与世界打交道，那是读过的书、认识的人、听过的故事、爱吃的食物以及有过的梦想。童年和家乡造就了现在的我，那我又为什么离开了那方心心念念的水土呢？是为探索更广阔的世界，还是寻找人生的中心？这一路上，我学到了生存的本领，拥有了行走的能力，却还在寻找世界的中心，并且又一次发现了自己的家乡。

原来，童年时的我，在家乡就已经体验了世界上所有的风景。当我长大后，走在遥远的地方，遇到的一切美好，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那种感觉，就是家乡曾给予我的，一直深埋在我的心底，随时等待被唤起。当我走在更远的地方，偶尔会不安甚至慌乱，但家乡就像灯塔，永远照耀和激励我的勇敢前行。

我现在的居住地，并不靠近家乡，也许将来还会移居好几个地方，去探索更辽远、更广阔的世界，但家乡却是唯一的，是我永远可以安放自己灵魂的地方。

“岁月在墙上剥落看见小时候”，无论身在何处，我知道我一直还有一个家乡可以回去——也许这就是我和我的家乡既简单又亲密的关系吧。

我在孔子故里歌唱

图文 本报记者 刘帝恩



11月23日晚间，黄亚洲与他的最新诗集《我在孔子故里歌唱》，在济宁宝泡产业园的读书活动中，与读者见面并举行了主题讲座。

黄亚洲诙谐地说起自己和济宁、曲阜缘分，“我是济宁的外甥。我妈妈的妹妹，也就是我的小阿姨，嫁给了济宁人。随后他们到曲阜

定居。我多次来济宁，有游玩，也有探亲。”也更多地谈到，在与济宁、曲阜的结缘中，对孔孟儒家文化的认识：

我长大以后，来到济宁，来到曲阜，无数次地，十多次、二十多次，我妈妈经常来，我的亲戚也在这里，多次走三孔，看到有关书籍，我越来越感兴趣。

慢慢地就发现，儒家文化的影响无处不在，而且儒家文化里面有非常积极的内容，很智慧的东西，而且很庞大地存在着，这个是回避不了的。我有次到日本去，就能感觉到，中国的儒家文化，非常顽强的存在着。我1995年参加中国电影代表团，去出访日本，和日本专家学者交流，也深深地体会到，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，也体会到日本整个文艺界，他们的知识分子对儒家文化的看法。他们非常肯定，我们的儒家文化对整个社会的非常巨

大的作用，特别是东方，这种意识形态中支撑性的作用。

我到曲阜多了以后，看了一些书，还和我们浙江省的儒学会进行了交流，参加他们的活动，和他们交流。感觉到了孔孟之道里面的世界大同，感觉到了“仁者爱人”“仁义礼智信”等孔孟文化的核心。我们有很多的例子证明这些东西，比如牺牲部分个人利益，去保护集体利益，这和西方是完全不同的。西方人老是说，这个是隐私，那个不能碰，而我们就不同了，我们的健康码，数据是一直在记录的。但是我们不担心这个所谓的隐私，因为我们相信，我们这部分隐私交出去以后，我们的人身安全得到了保障。我有时候也在想，为什么美国人那么不爱戴口罩，难道不戴口罩就是他们的意义？戴口罩这么可怕吗，这都是极端的个人主义，完全漠视集体利益。这时候我就在

作家要有调动人们情感的能力

图文 本报记者 刘帝恩

来到济宁，孔林、孔府、孔庙的历史厚重感，深深震撼了黄亚洲。在写作《我在孔子故里歌唱》的时候，黄亚洲对孔子的信仰和价值观进行了描绘。孔子的行为、思想、价值观，成为诗中的核心内容。

黄亚洲，诗人、剧作家，现任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、中国作家协会影视委员会副主任，《诗刊》评委，曾任第六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。作品获国家图书奖、鲁迅文学奖、金鸡奖、金鹰奖、华表奖、飞天奖、百合奖，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4次。

作为诗人和文学组织工作者，不光和诗人打交道，也和散文家打交道，和作家打交道。广泛的交流与涉猎之后，黄亚洲涉足电视剧剧本。尤其在嘉兴担任作协副主席的时

候，在红船上工作，让黄亚洲对主旋律作品的创作，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得天独厚的条件。作为作协主席和党员作家，黄亚洲体会到了沉甸甸的责任，他的作品就是要把重大题材表现出来。

主旋律的创作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。要紧密结合当前最新的理论研究，增加情节与思考。每一次创作，都让黄亚洲对党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。作为编剧，读者和观众能从自己作品中获得对党史更加全面的认识，是一件十分光荣地事情。

今年年初的新冠疫情，影响了每一个人。作家和诗人感情不能缺席，认识不能缺席，意识不能缺席，要鼓舞人们勇敢抗击疫情。他一天写三四首诗，用电话采访的形式，讴歌抗击新冠疫情路上感人的故事。一个诗人，真正有

了创作的冲动，就要把思考及时表达出来。今年3月，黄亚洲出版了全国乃至世界第一本抗疫主题的诗集。

黄亚洲是个不折不扣的乐观主义者。人活在世界上，就要鼓舞着别人一起往前走，人类是不朽的，但把积极心态传授给同胞，就有意义。年轻的心态，是71岁的黄亚洲依然积极创作的力量源泉。

当《文化周末》记者问到，红色文化剧本创作过程中，如何处理虚构和非虚构间的关系？黄亚洲给出了八个字的答案：“大事不虚，小事不拘”。关键是在那个年代，人物的思想和经历，能不能说出那个话来，以及人物说话的立足点，像不像这个人说的。这其实考验的是作家的智慧和本领。

弘扬优秀传统文化，向前看和向后看之